

辜鸿铭最早提出“新儒学”“儒学三期”“情欲”等(下)

——附论“理学”是“道学”和“心学”的合称

薛鹏志 高令印

三、儒学三期

对于儒学的发展过程,一般持“三期说”。此由“牟宗三提出、杜维明鼓吹、而在近年开始流行”。“‘儒学三期说’以心性论作‘道统’来概括和了解儒学,认为这是儒学的‘神髓’、‘命脉’”。^[27]刘述先在香港中文大学“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”上,大“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”,即先秦儒学、宋(元)明儒学、现代新儒学。此题于200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,25万字。这些名家的论说,似成定论。当然也有不认同的观点,李泽厚就有《说儒学四期》著作出版。这里不讨论三期、四期的优劣,仅说广泛认同的三期说,非牟宗三之首创,是闽籍学者辜鸿铭最先论说的。

辜鸿铭认为,“中国文明开始于夏代,发展于商代,全盛于周代”。“在夏代,正如我们大都知道的,出了一个名叫禹的皇帝,他在兴修水利上获得成功。由此可以看出,当时有着相当发达的物质文明”。“在商代,中国文明在道德以及心的方面,在形而上学的方面得到了相当的发展”。“周代文明凋落的征兆就在于特别重视知的方面。通俗的说法就是重视脑而不重视心,就是人们只注重知事而忽视行事”。“以后,中国文明就朝着两个方向发展,一方面

是老、庄学说的兴起,另一方面是礼的进步”。“为了校正中国文明过于向知和礼仪发展的偏向,为了挽救中国文明,孔子想了不少办法,但都没有能够成功”。“孔子只留下了一幅建设文明大厦的蓝图,那就是‘六经’。因为有这‘六经’,我们就可以按原来的样式,重建文明的家园”。接下来,辜鸿铭讲了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(即坑“乱道之儒”)、“把分崩离析的中国合而为一”;但是,“秦始皇认为,当时的社会既不需要文化,也不需要学者,它需要的是法律。因此,他重用法家,但依靠法律维持的文明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因为秦始皇以官吏取代学者,就使他的事业归于失败,因此秦朝的统治不过二世就垮台了”。汉高武帝接受大学者的谏议,借助道德的力量,也就是文化,中国大地上消失的文明又重新回到中国,把孔子留下的蓝图重新进行整理。这个时代最为兴盛的学问是“黄老学派”,导致儒者和侠士的大量出现。以后又出王莽“新学”。中国混乱时代过去后,又经过东汉,孔子思想成为中国的国教。因为当时只注重“心”的方面,缺少“知”。“为了弥补这个缺陷,便有了佛教哲学的兴起”。^[28]

以上介绍的辜鸿铭关于秦汉以前中国历史文化的梗概,就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期。

接下来,辜鸿铭又讲儒学的复兴和宋明新儒学的问题。辜鸿铭说:

在周代,人们对“知”的方面倾注了过分的热情;但到了东汉时代,一切都翻过来,人们对“智”的东西是不闻不问,却在“心”的方面下了很多工夫。为了弥补这个缺陷,便有了佛教哲学的兴起,因为佛教恰恰就在此时传入了中国。佛教所带来的“智”的东西,同孔子思想中“仁”的方面相结合,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,它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浪漫的时代,即三国时代。佛教给中国文明增添了不少色彩,但同时也招致了混乱。中国社会的政治就因此走向了堕落,从而为少数民族入侵提供了机会,以后就有了“五胡乱华”。^[29]

在这里,辜鸿铭一方面肯定唐宋学者们复兴孔子的核心思想“仁”,复兴儒学,同时吸收佛教中有用的东西,从而构建新儒学。这就是第二期儒学,即宋明新儒学(理学)。

辜鸿铭也预示到,在宋明新儒学之后会出现“现代新儒学”,即儒学第三期。他说:

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从儒学的束缚中走出来。我认为,可以依靠同西方文明的交流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倒是东西方文明互相接触所带来的一大好处。仅仅靠学讲外国话,住帝国旅馆,跳跳舞是无法领会西方文明的。诸君不要只学其表面的东西,而要领会它的本质,想真正地登入文化的殿堂是相当不易的,而且不存在捷径。我个人或许知识浅陋,没有资格这样说,但我还是衷心希望诸君能继续我的事业,加深拓宽自己的学问,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。^[30]

在这里,辜鸿铭讲到现代儒学的困境“可以依靠同西方文明的交流来解决”,这正是现代新儒学家们用“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的谋求现代化理论”的思维方式。^[31]

还有,被刘述先称为头号现代新儒学的梁漱溟,其最主要的哲学概念“意欲”,也跟辜鸿铭的“情欲”相似。辜鸿铭说:“在这个世界上,除了自然力,还存在一种较自然力更可怕的力量,那就是蕴藏于

人心的情欲。”“因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,去控制和约束人们的情欲”,“导致军国主义”。^[32]梁漱溟认为,人类基本上有三种“意欲”: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,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,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。^[33]辜鸿铭“情欲”与梁漱溟的“意欲”都是社会的主要动力。辜鸿铭说于1915年,而梁漱溟则说于1921年,相差五六年。

四、理学是道学和心学的合称

“宋明理学”中的程朱学派,当时被称为道学。“道学”最早见于北宋程颐的著作。他说:“道学日明,至言日进,弊风日革。”^[34]他又说:“自予兄弟倡明道学,四方惊疑,能使学者视效而徒信。”^[35]“既而门人朋友为文以叙其事迹,述其道学者甚众”。^[36]这里的“道学”是指二程兄弟的学说。到了南宋,朱熹肯定二程学说为道学。朱熹说:“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、千载不传之后,可谓盛矣。”^[37]当时,是把程朱这派的学说称为道学。朱熹编的《伊洛渊源录》,所选人物的作品是周敦颐、二程、邵雍、张载、张戢、吕希哲、范祖禹、杨国宝、朱光庭、刘绚、李籲、吕大忠、吕大临、苏昞、谢良佐、游酢、杨时、刘安节、尹焞、张绎等,是程朱道学系统,或称其为程朱道学学派。《宋史》特立“道学传”,在“儒林传”之前,列周、程、张、邵、朱及其门人等。《宋史·道学传》的名单与朱熹编的《伊洛渊源录》名单基本一致。而陆九渊、陆九龄弟兄等则被列入“儒林传”。朱熹说:

一有刚毅正直、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,则群讥众排,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,上惑圣聪,下鼓流俗。盖自朝廷之上,以及闾里之间,十数年来,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。^[38]

禁锢“道学”,即禁锢天下贤者,以至社会风气由此变坏。

张载说:“朝廷以道学、政术为二事。”^[39]在“庆元党禁”(1195-1120)时期,朝野称程朱学派为道学。兵部侍郎林栗弹劾朱熹,谓“窃张载、程颐之余

绪,为浮诞宗主,谓之道学”。^[40]这里十分明确把张载、二程、朱熹之学称之为道学。当时,程朱学派被称为道学。

另一方面,当时陆九渊、陆九龄弟兄的学说排斥于道学之外,被称为心学。陆九渊弟兄亦批评道学,表明自己非道学。陆九渊说:

道本日用常行,近日学者却把做一事,张大虚声,名过于实,起人不平之心,是以为道学之说者,必为人深排力诋。……世之人所以攻道学者,亦未可全责也。盖自家骄其声色,立门户与之之为敌,哓哓腾口实,有所未孚,自然起人不平之心。^[41]

“心学”是发明“本心之学”。当时已有“心学”名称。陆九渊的弟子袁燮后人袁甫说:

宁宗皇帝更化之末年,兴崇正学,尊礼故老,慨念先朝鸿儒之师,咸赐嘉谥,风励四方,谓象山陆先生发明本心之学,大有功于业教,赐名文安。^[42]

这里明确说明陆氏兄弟之学“发明本心”,故为心学。

“理学”之名,南宋已出现。开始只是一个学术术语。朱熹谓“理学最难。可惜许多印行文字,其间无道理的甚多,虽伊洛门人亦不免如此。……万物之理,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”。^[43]陆九渊认为,“本朝理学,远过汉唐,复有师道”。^[44]宋宁宗嘉定年间(1214-1220),魏了翁等上疏请赐周敦颐谥。当时楼观说:

理学之说,隐然于唐虞三代之躬行,开端于孔门洙泗之设教,推广于子思、孟轲之讲明,驳杂于汉唐诸儒之议论,而恢复于我宋濂溪先生周公敦颐。^[45]

这里的“理学”是泛指孔孟儒学,只是个学术概念,非学派名称。

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(1403-1424),朝廷敕胡广等编纂《性理大全》等,把程朱道学与陆氏心学、道学与心学融合在一起。接着,明王阳明发扬陆九

渊心学。王阳明说:“圣人之学,心学也。尧舜禹之相授受曰:‘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。’此心学之源也。……故吾常断以陆氏之学,孟氏之学也。”^[46]王阳明又说:

晦庵之与象山,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,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。今晦庵之学,天下之人,童而习之,既已入人之深,有不容于论辨者。而独惟象山之学,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,而遂藩篱之。……而象山辨义利之分,立大本,求放心,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,其功亦宁可得而尽巫之。而世之儒者,附和雷同,不究其实,而概目之为禅学,则诚可冤也已。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,以为象山一暴其说,虽以此得罪,无恨。^[47]

王阳明企图调和朱学与陆学,宣扬理学。理学包括道学与心学。明末黄宗羲说:

从来理学之书,前有周海门《圣学宗传》,近有孙钟元《理学宗传》,诸儒之说颇备。……尝谓有明文章事功,皆不及前代,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。牛毛茧丝,无不辨晰,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。……濂溪无待而兴,象山不闻所受,然其间程、朱之至何、王、金、许。^[48]

明清之际的周海门(字继元,阳明后学)《圣学宗传》、孙奇逢(号钟元)《理学宗传》等,包括道学与心学。理学涵盖道学与心学,是学者们所认同的。

宋明时代的学者,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,从不同方面论证“性即理”“心即理”“气即理”,都以理学来统摄,是宋明理学内部的问题。

顺便指出,在讲到儒学发展的第三个大时代的儒学研究时,有称“现代新儒学”或“现代新儒家”。这两个概念有所不同。因为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思想,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,需要众多学者从诸多方面研究并实地考察、体认。因此,应由“现代新儒家”转用“现代新儒学”,由“家”的一元性(学派性)转为“学”的多元性,包容较多的近现代对儒学研究有成就的学者,包括日、韩等国的著名

学者。^[49]

注释:

- [1][31] 方克立:《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》,《天津社会科学》,1986年,第5期。
- [2][27] 李泽厚:《说儒学四期》,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2年,第41页、第5页。
- [3] 高令印:《简明中国哲学通史》,厦门大学出版社,2002年。
- [4] 高令印、高秀华:《辜鸿铭与中西文化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8年。
- [5][7][20][21][22][24][25][28][29][30][32] (清)辜鸿铭著,黄兴涛等译:《辜鸿铭文集》,海南出版社,1996年,下册第233页、第229—230页、第300—301页、第300页、第300页、第304页、第19—20页、第299—300页、第299—300页、第301页、第19—20页。
- [6][12] 《辜鸿铭传》,《清史稿》,卷四八六。
- [8] 沈来秋:《略谈辜鸿铭》,《福建文史资料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1年,第5辑第115页。
- [9] (清)辜鸿铭著,语桥译《清流传》,北京东方出版社,1997年版,第4页。
- [10][11][15] (清)辜鸿铭著,冯天瑜标点:《辜鸿铭文集》,岳麓书社,1985年,第55页、第2页、第2页。
- [13] 《辜鸿铭和中西文化》,《文摘报》,1986年9月14日。
- [14] 胡适等著,伍国庆等编:《文坛怪杰辜鸿铭》,岳麓书社,1988年,第12页。
- [16][17] 黄兴涛编:《旷世怪杰》,北京东方出版中心,1998年,第3—4页、第3页。
- [18] 方旭东:《新儒学义理要论》,三联书店,2019年7月,

“导言”附注(1)。陈来:《宋明理学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年,第2页。

- [19][33] 刘述先:《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》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2006年,第72—74页、第188—189页。
- [23] 牟宗三:《宋明理学的问题与发展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年版,第17—18页、第74页。
- [34][36] (宋)程颢、程颐著:《二程集》,中华书局,1981年,第552页、第603页、第639页。
- [35][38] (宋)朱熹著:《朱子文集》,台湾财团法人德富文教基金会,2000年,第3774页、第475页。
- [39] 《张载集》,中华书局,1978年,第349页。
- [40] (元)脱脱:《宋史》卷三九四。
- [41][44] (宋)陆九渊著,钟哲点校:《陆九渊集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卷三五第437—440页、卷一第14页。
- [42] 清同治《贵溪县志》卷四三《学术·书院》。
- [43] (宋)黎靖德编:《朱子语类》卷六二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1485页、第1489页。
- [45] (宋)周敦颐撰:《周子全书》卷二一。
- [46][47] 《阳明全书》卷七《象山文集序》、卷二一《答徐成之(壬午)二》。
- [48] (明)黄宗羲:《明儒学案》卷首《明儒学案·发凡》,中华书局,2018年,第14—15页。
- [49] 刘述先:《当代新儒家人物论》,台北文津出版社,1994年;《东方》,1996年,第6期。

(薛鹏志:厦门大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;高令印:厦门大学哲学教授)

南平举办“朱子文化的新时代价值”研讨会

9月18日上午,南平市举办以“朱子文化的新时代价值”为主题的研讨会,福建省社科联副主席陈文章,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、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马照南,福建省政协提案委原副主任、南平市政协原主席张建光,武夷学院党委原副书记、中国社科院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姚进生,中共南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南平市朱子文化保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金健,南平市社科联主席邢振华及南平各县市社科联负责人、南平市朱子文化讲坛客座教授等40多人出席了会议。

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22篇。会上,各位学者、嘉宾围绕南平市朱子文化讲坛课题《朱子的“理识”与“知行”》开展研讨,马照南、姚进生、张建光分别进行点评。

本次研讨会是福建省社科界2019年学术年会活动之一,由南平市社科联、南平市朱子文化讲坛、南平市民俗学会承办。(南风)